

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

# 挣脱 命运的 魔咒

段云球◎著

华夏出版社



# 挣脱命运的魔咒

段云球◎著

生命与希望的礼赞  
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挣脱命运的魔咒/段云球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12  
(生命与希望的礼赞——宓春磊中国残疾人作品出版基金丛书)  
ISBN 978-7-5080-5583-1

I. ①挣… II. ①段…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090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09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200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20.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厄运降临/1
- 第二章 挣脱羁绊/38
- 第三章 青涩年华/87
- 第四章 初恋很美/138
- 第五章 情沐沧海/165
- 第六章 随父远行/195
- 第七章 冲浪京城/227
- 第八章 母爱铭心/261
- 第九章 踏歌而行/291
- 后 记/299

## 第一章 厄运降临

当厄运的魔鬼来毁灭一切的时候，幸运的天使会造就另一种重生。当所有的哭泣和呐喊都不能改变生命的状态时，那就擦干眼泪停止叹息去改变生命的航向吧。或许，另一条路即在眼前。

### 1

我们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人成为伴侣，更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家庭，更没有权利选择我们的父母。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生命。

这个世界上倘若真有许多神奇，那么，在生命面前，所有的神奇都好似生命之火的微光。当我们为生命而歌的时候，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父母，正是他们的呕心沥血创造了生命的神奇！

我的身世有些复杂，从出生到成长，一直受到悲欢离合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严格意义上讲，我有两位父亲和两位母亲。一对是生我养我的、有着直接血缘关系的父亲母亲，另一对则是与我有着间接关系、与我的父亲或母亲却有着直接关系的母亲或父亲。他们是我的大妈和我的继父。

但，这不是我父母的错。父亲的再婚，是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而母亲则是为了在生活的窘境中能更好地生存。如果不是爆发抗日战争，父亲和大妈也许会白头偕老。可以说，是那场改变民族命运的反侵略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的父亲和我的大妈就是那个时代个体命运的一个缩影。

坦率地讲，继父对我的影响比大妈对我的影响更深刻更真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继父就是我的父亲。至少在七岁以前，我一直随我的继父姓朱。在我有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后，继父仍然对我呵护备至，对我们兄弟三人一视同仁。我的继父虽然算不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优秀父亲，却是一个很善良很有爱心的人。

我从大妈身上懂得了什么是忠贞，什么是宽容，什么是坚忍，什么是真爱。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为了仅有一百多天的婚姻，付出了整个的一生。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妈心中，父亲自始至终是她唯一的爱人。也许，正是这份对爱的执著，使我的大妈与父亲分手后终生未嫁，甚至连一丁点儿的绯闻都没有出现过。不仅如此，即便与父亲离婚后，在我的爷爷奶奶面前，大妈和我的大娘、婶娘一样，依然尽着一个儿媳的义务。

这种情况实属罕见,这种品质难能可贵。我有时候在想,倘若不是关系民族存亡的那场战争,父亲和大妈或许是一对很幸福的人儿。果真如此,对父亲和大妈而言,这是一个很圆满的人生之旅。不过,这也意味着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以及后来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从尊重生命的人性角度而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应该虔诚地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毕竟,只有生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绚丽的色彩。

我的继父是铁路工务段的工人,属于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一类人。记得我刚记事的时候,母亲还在到处做临时工,继父不管走到哪里都领着我,几乎寸步不离,好像生怕我走丢了。当时,继父上班要乘坐专列班车去很远的地方,可是为了母亲上下班便利,他经常带着我去上班。我在五岁以前的许多时光是看着继父和很多铁路工人抬着铁轨、扛着枕木、喊着劳动号子在修铁路中度过的。现在想起来,那情景在脑海里依然活灵活现,仿佛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

我的继父从我记事到后来很久的日子,一直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我记得很清楚,每当我带两个弟弟出现差错的时候,母亲会很生气地用扫帚抽我,继父总是挺身而出用身体挡住母亲抽向我的扫把,然后冲母亲大吼:“谁家娃儿这么小,就带两个娃了!”其实,母亲每次打了我往往她流泪,而我则倔强地瞪着她不吭气。时至今日,我对“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句话,依旧感同身受。母亲打儿子,一定是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如今回想起来,我的确足够淘气,经常扔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弟弟,独自跑出去玩耍。有一次家里火炕烧得太热,

炕席着火,差点烧死正在熟睡的小弟。很多年以后,我们兄弟谈起此事,小弟不仅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反而语气里充满了留恋。是的,是留恋。留恋我们老实质朴的共同父亲,还有那段清贫而快乐的童年时光。

我大弟弟出生时我还很小,具体的一些事不记得了。在我五岁那年小弟出生了,恰好此时继父单位给我们家分配了一套新住房。依稀记得搬家时只用了一辆马车,一趟便搬完了家里所有的东西。由此可见,当时的一个家是多么简单。我们搬家那天,小弟还未满月,母亲头上还戴着防风的头巾。母亲簇拥着我们兄弟三人,坐在颠簸的马车上,缓缓离开了借住的旧房子。从此,我们家总算告别了借住的历史,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新家。

小弟满月不久,母亲便找到一份下井挖煤的工作。父母为了工作便利,将两个弟弟放在附近一户人家寄养。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外名叫“大酒包”,在不喝酒的情况下,绝对是个好女人,但她嗜酒如命,时不时喝得酩酊大醉。弟弟放在这样的人家,父母一直不大放心,因此将改变这种状况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特别是母亲。她常对我说:“满仔快长大,满仔大哩,老弟就好过哩!”虽然我还不理解母亲话里的含义,但是我感受到了母亲目光中的那份期待。

果然没过多久,父母请来一位妇女照看弟弟。这位妇女是继父的老家亲戚,我管她叫姑姑。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继父的老家人,由于时间久远,她的样子早已没了印象,只记得她很勤快,不但精心照顾着两个弟弟,而且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她在我们家没多久,便匆匆赶回老家收麦子去了,从此杳

无音信。她不但教会我照看弟弟，还教会我做简单的饭菜。她离开以后，我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家庭的担子，也开始了我快乐而又有些辛涩的童年。

我们不必哀叹命运的不公，更不必感叹生不逢时。人生好似一条起伏的波纹线，我们每留下的一个脚印，都是这条线上的一个注脚点。至于这个点是不是鲜亮，不是看我们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而是看我们能不能坚实走下去。而童年迈出的每一步，则是构成未来人生走向的基点。与其羡慕别人有个好爸爸好妈妈，不如让别人羡慕自己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

## 2

我小时候很淘气，属于孩子堆里最淘气的一类，用大人的话说是“作翻了天！”母亲为此没少训斥我，生气时用扫帚抽屁股。记忆中，多次看见母亲因出手过重而内疚自责，摸着 my 屁股上的伤痕悄然流泪。那时候对“打在儿身，痛在娘心”这句话，便有了初步的体会。之所以说初步体会，是源自母亲的眼泪。感觉上，母亲流泪“后果会很严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畏惧心理。而真正体会到父母的舐犊之情，是若干年以后了。

我的淘气不仅没有招致左邻右舍的反感和厌恶，反而得到许多大人的青睐和赞许，他们甚至很羡慕我的父母，说他们有个聪明懂事的孩子。其实，这并不是我多么聪明可爱，而是我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的担子。

那时候照顾两个弟弟的吃喝拉撒睡,是我每天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动症,我在照看两个弟弟的同时还包揽了力所能及的家务活。类似于劈柴烧火,扫地擦炕,换洗尿布的事情,我不需要父母的动员,便在不经意中完成了。偶尔来了兴致,我还会做一顿简单的饭菜。不过,我熬的玉米粥不是太稀就是太稠,最惨的要数做菜了,我切的土豆片厚薄不一,炒菜过程中最后往往变成了土豆泥。尽管如此,父母不仅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对我大加赞赏,极大鼓舞了我的主观能动性。

我每天做完该做的事情,趁弟弟睡觉的工夫便忙里偷闲地去左邻右舍串门。记得那是初冬的一天,朔风刺骨,寒气逼人。邻居家王婶当时在坐月子,我去他们家里玩耍,看到王婶头扎毛巾,蜷缩在被子里直哆嗦。原来炉火熄灭后土炕与火墙很快变得冰凉,王婶产后身体虚弱不能迎风出门,无奈之下只好钻进被窝御寒。我见此情形,免不了要逞能一下来展示自己,于是推门而出,抡起劈柴的斧头好一通忙活。我点燃炉火后,得到王婶好一番夸奖,不禁美滋滋的。因为心里高兴,便不顾王婶阻拦,又顺便将泡在盆子里的婴儿尿布洗了。晚上王叔下班后特意给我送来两个鸡蛋作为犒赏,那时候两个鸡蛋比现在的两斤鸡蛋的实际意义大得多。从此以后我常去王叔家帮着王婶做些小事情,一直到我出了车祸为止。多年以后他们的儿子长大了,我却成了需要照顾的人,没想到当初我曾经照看过的小弟弟,日后竟然背着我去过很多地方。也许,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我六七岁的时候,自己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却是两个弟

弟的“奶妈子”了。我经常背着小弟领着大弟加入到伙伴们的行列。因为要一边照看弟弟，一边和伙伴们玩游戏，往往顾此失彼。由于我不能专心致力于游戏，拖了伙伴们后腿，没少受大伙儿的奚落。也许出于孩子般的一种叛逆，我那时非常反感有人说我怕这怕那。为此，我有时故意将两个弟弟扔在一边，不管不顾，以示胆大。这种过于逞强的逆反心理终于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受到母亲的严厉惩罚。一次，我趁弟弟睡觉的时候与小伙伴出去滑冰。以往，玩到中途应该先回家看看弟弟睡醒了没有，然后给小弟喂奶。那天我准备回家时，有人说我胆小鬼，令我很没面子，我便强迫自己留了下来。快天黑时，我才猛然想起母亲快下班回家了，这才着急忙慌往家赶。当我气喘吁吁回到家中，还是比母亲晚了一步。我进屋时小弟哭得很厉害，母亲一脸怒气，正在用酒水给他揉头。这时，大弟跑过来告诉我，小弟从炕上摔到地下了。我听了以后，吓得浑身直哆嗦。

母亲给小弟揉完头上的大包，忽然转身走向墙角抓扫帚。我一看大事不好，下意识地破门而逃。母亲追了出去，一边追一边喊：“鬼崽子，莫跑！鬼崽子，莫跑！”

我是第一次在母亲生气发作时抱头鼠窜。不知道是不是后有追兵激发了自身的潜能，我还是第一次跑得如此之快。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跑，爸爸下班回来就没事了。

也许母亲习惯了我以往敢于面对错误的勇气，一时之间还不适应我逃避责任的懦弱，我跑得越快越刺激了她不甘落后的个性。于是我们上演了一幕母子狂奔的情景。尽管我倾尽全力急速冲刺，毕竟也只是个孩子，经过三四百米的角逐，

便落到了母亲手上。

母亲气急败坏，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几乎是一路拎着我回家的。我看到母亲脸色铁青，浑身哆嗦，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油然而生。果然，母亲进屋后直奔墙角找扫帚，没想到大弟弟将扫帚藏了起来。母亲一时间没有找到顺手的東西，一怒之下将我拽进厨房，顺手抓起菜刀朝我高高举起。我瞪着寒光闪闪的菜刀，顿时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咣当”一声，菜刀砍在砧板上。我脑子“嗡”的一声响，随即瘫软到地上。母亲突然抱起我，跺着脚哭喊道：“你咯鬼仔！做么子咯样莫探（听）话哦！”

事后，母亲感觉到自己有些过头了，于是和父亲再三安抚我。我知道自己错了，但我更知道母亲也不对。因此，面对他们的安抚我一声不吭，用倔强的沉默作为无声的抗议。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常做噩梦，哭喊着从噩梦中惊醒。母亲非常焦虑，不知听了谁的建议，说是要给我收魂，竟然破天荒地又是求神又是烧纸。可能是心理作用使然吧，没过几天，我真的不再做噩梦了。这件事，在我的童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霾，相当长的一段日子，只要想起此事，便不寒而栗。正是有了这样的一次教训，我照看弟弟时再也不敢怠慢，深得父母喜爱。

舐犊之爱是人之常情，拔苗助长也是人之常情。孩子的茁壮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呵护与约束，但是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我们可以质疑父母的施教手段，却不可以怀疑父母“恨铁不成钢”的良好愿望。

我长大后，每每想起此事，得出一个结论，母亲的性格或

许与坎坷的人生经历有关。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具有男人般坚毅的性格,起伏不定的脾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导致我们母子感情一直处在若即若离之间。母亲对我的溺爱,没有因为我身体的变故和岁月的变迁而改变过,我对母亲亦是如此。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彼此的牵挂和思念好似吊在心底的秤砣一样,沉甸甸的。但是我们只要聚在一起,却又形同陌路无话可说。后来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与母亲的错,而是和许许多多的母子相似,缺少理解与沟通,我们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代沟。好在这一切并没有真正伤害到我们血浓于水的母子深情。

### 3

我小时候除了贪玩淘气,最喜欢的就是看电影和连环画。

还记得刚看完《闪闪的红星》电影那会儿,潘冬子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做梦都幻想着成为他那样的小英雄。因此,曾一度对“打倒地主恶霸”的游戏乐此不疲,为假扮游戏里的潘冬子,常常与小伙伴们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甚至为达目的不惜以退出游戏相要挟。当然,做潘冬子似的英雄人物所付出的代价便是接受地主恶霸的欺负和压榨,为此伙伴们没少趁机作弄我。

那时候的连环画大多是黑白素描的印版,黑白电影剧照印版的算是很高档了。一般情况下,一本连环画讲述一个故事,偶尔也有上中下三集的套装版。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像《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系列版本的,买齐整套连环画的人并不多,这也促使很多人萌发了相互换看的愿望。而这种愿望,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那时的孩子与现在的孩子比较起来,要单纯得多,哪怕是一本连环画,一场电影,一个再简单不过的玩具,几个伙伴们在一起游戏,都是快乐的源泉。

我是快乐的,因为我有很多连环画,这在当时很有诱惑力,每天都吸引着一群孩子在家里玩耍。我的连环画大多来自父母对我照看弟弟的奖励,他们的本意也许是想用连环画将我拴在家里好好照看弟弟,没想到却触发了我对书本的兴趣。尽管我还看不懂连环画的内容,但是那些刀枪并举的画面,像今天的卡通片吸引孩子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

母亲知道我不识字,见我对连环画着迷,常说“只会看菩萨打架”。在湖南土话里“菩萨打架”的“菩萨”二字,原意大概是泛指没有生命迹象的图腾和雕塑以及肖像画。母亲这话是说我只看到了画面的表面意义,根本不理解画面的真正内容。她说的没错,我当时看连环画,完全出于对画面的浓厚兴趣,要么穿凿附会,要么按图索骥,大多是按着自己的想象方式在曲解。也许兴趣所致,一旦遇到连曲解也难以进行下去的地方,我便去问别人,并且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个人是谁呀?”“是好人还是坏人?”“他咋那么厉害呢?”或许,正是这种“问”,让我慢慢知道了画面的意义,随着兴趣的日趋浓厚,养成了“想知道”的习惯。而这种习惯一直沿袭至今。记得那时我问得最多的人,就是邻居家的陈阿姨。

陈阿姨是小学老师。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我们家周围有文化的人很少,陈老师便是其中一位。她的丈夫和我的继父同属矿务局职工,分房时凑巧分在同一居住区,我也有幸在童年的启蒙阶段接触到了知识分子。

陈阿姨在众人眼里有些怪,与人见面时虽然也笑着打招呼,却极少与邻居们往来。她经常坐在自家门前的小凳子上看书看报纸,还时不时地给两个女儿讲故事。偶尔,不知道是不是两个女儿不听话,她很生气地瞪着她们。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羡慕得不得了。我多么希望,我的母亲有一天也像陈老师那样给我讲故事。

陈阿姨特别爱干净,从两个女儿的衣着打扮上,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她的两个女儿和我一般大小,虽然穿戴朴素却整洁而简约,与我这般淘气的泥孩子对比起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巨大的反差面前,我幼小的心灵难免不产生自卑感。虽然我胆子很大,几乎没怕过什么人,对陈阿姨却充满了敬畏,完全以一种仰视的目光来看她以及她的家人。记得有那么几次陈阿姨给女儿讲故事时,我刚好遇见便躲在一旁偷听。尽管听得不太清楚,却津津有味。我和她的女儿经常互换连环画看,好几次我试图以此为借口溜进他们家,可是每次走到门口却踌躇不前。一旦听到脚步声,立刻悄悄溜走。

有一次我和她女儿换看连环画,壮着胆子跟着她女儿去她们家,没想到刚好看见陈阿姨在打扫屋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看见陈阿姨好似老鼠看见猫。任凭她女儿怎么拉拽,我站在门口就是不敢进去。直到陈阿姨的一句“球球呀!快进来吧!”我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子。陈阿姨远比我想象中温和亲切得多,甚至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慈爱。那时候,糖果的意义比现在饮料的意义要珍贵许多。我第一次到陈阿姨家,她像招待客人一样拿出糖果来招待我,真是让我受宠若惊。陈

阿姨见我不好意思，亲手剥去糖纸将奶糖喂进我嘴里，顿时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我在陈阿姨家里第一次见到《中国少年报》，也第一次听说《中国少年报》上有个知音姐姐，专门回答少年儿童提出的问题。从此以后，我不但有机会听陈阿姨讲故事，而且随时可以去她们家看连环画。难能可贵的是陈阿姨在我求知的事情上，几乎有求必应。后来，有好多连环画都是陈阿姨手把手教我看下来的。陈阿姨有个习惯，每次教我看完一本连环画，要我将连环画里的故事讲给她听。她听的时候非常仔细，一旦我出现错误或者遗漏，立即予以修正。

陈阿姨是唯一用“糖衣炮弹”检验过我的人。有一次，我去她家看连环画，她说要带女儿去买菜，叫我帮忙看家。她临走时故意将一些零用钱放在显眼的位置，其中有一角二角五角的，一分二分五分的堆积在一起。那时候的钱真的值钱，两分钱可以买一根纯牛奶冰棍，一角两分钱可以买一瓶酱油。在当时一两角钱对孩子已经很有诱惑力，更别提五角了。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是我的品质优劣与否的问题，而是我正全神贯注看连环画，根本没有去想那些钱的价值问题，因此幸运地绕开了陈阿姨设下的“陷阱”。也许，环境真的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性情。陈阿姨家干净整洁、井然有序，书架上摆满了图书、画报和报纸，与我们家的“杂乱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但是对我而言，陈阿姨家仿佛就是一个人间天堂。我那时候每次去陈阿姨家看连环画，都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那种愉悦的心情，远非一根冰棍几颗糖果可以抵消的。倘若换一种环境，换一个地方，我看见那么多

钱,难免没有非分之想。由此可见,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么重要。

陈阿姨事后少有地去了我们家,对我父母说:“球球这孩子是根好苗子,你们好好培养,一定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话在今天看来,具有很浓的形而上的口号意味。而当时的人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不知道父母当时作何感想,但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打心里高兴。是啊,当一个仅仅是称呼上的阿姨对孩子寄予深切厚望时,更何况他的父母呢!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一些难忘的事,难忘的人。难忘,意味着深刻,意味着隽永,也意味着感念。是的,每当我回想童年的那些往事,有些人仿佛穿越了时空的隧道,倏忽一下站在了我的面前,鲜活而清晰。虽然时光荏苒,岁月变迁,我不再是那个顽皮、倔强的孩子,但是当我重新面对这些曾经熟悉的脸庞,我浮躁的心立刻平静下来,一如当年孩童般的虔诚与敬畏。

我曾经想,在那么多的淘气孩子当中,陈阿姨为什么对我另眼看待?随着年龄的增加,阅历的积累,我终于找到了一点零星、破碎的答案,也算多少对一些事和人的认识与体会吧。陈阿姨对我另眼相待,并不是我有多聪明多好学。我从小到大都不属于聪明一类的人,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优点,我觉得“认真”二字更合适。以陈阿姨教书育人的眼光,不会看得出来。所以,我宁可相信,陈阿姨对我另眼相待的主要原因,是她潜意识里的一种教书育人的职业本能。或许,陈阿姨只想做一个教书育人的好老师,当时的学校却不是用来读书而是用来喊口号的。这与今天“唯成绩论”甚至“唯效益论”的学